



中國共產黨歷史 學習參考材料

第二輯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歷史學習參考材料

• 第 二 輯 •

目 錄

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六年的中國蘇維埃

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 …………… 蓋·培·愛倫堡 (1)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紅軍……………榮孟源 (50)

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六年的中國 蘇維埃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

蘇聯 蓋·培·愛倫堡

反動的勝利和中國革命浪潮之臨時低落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

叛變了革命的資產階級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就建立了南京政府。在形式上，這個政府好像把中國統一了。一九二八年夏天，國民黨的軍隊佔領了北京。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地主聯合一起，獲得了他們的勝利。

國民黨政府欺騙人民，說它是爲了國家獨立而奮鬥。於是它就發佈政府的公告，說行將修改不平等條約，希望取消治外法權等等。

南京政府同帝國主義列強簽訂了許多新條約。這些條約雖然在紙面上允許修改關稅率，但比那些舊條約並不更少奴役性。叛變了革命的國民黨南京政府馬上得到了美國的保護，因爲美國看到，南京政府是實現它的侵華計劃的最好工具。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商約簽字。同時，南京政府也接到了國際聯盟的邀請，國民黨的代表就在國聯大會上佔了一席之地。

南京所實施的新關稅就表明了其反人民活動的特徵。甚

至英國的工廠主都不把這新稅率看作中國的保護關稅。他們對這新關稅率毫不在乎。英國一九三〇年遠東經濟考察團在報告中指出：“整個地說，除了羊毛和人造絲，英國對華商務決不受新關稅率的威脅。”英國資本家既然如此看待這新關稅率，那麼這新關稅率還能給中國多少好處呢？

英國遠東經濟考察團在同一報告中又指出：“主要的煤鐵資源及煤鐵的出產都操在外國資本手中，所謂中國經濟的發展都是發生在外國勢力範圍所及的地區中，對工業化並無有力的推動，而南京政府又盡力表示，它當盡其力之所及以吸收外國資本。”

畏懼革命的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革命的印象還很新鮮，也就答應給南京少許讓步。其實這不過是些詭計。帝國主義者想利用這些讓步來加強叛變了革命的國民黨政府在國內的地位，製造南京政府在中國的威望。例如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八日英國與中國簽訂協定，把威海衛退還給中國，但仍保留其對威海衛海軍基地之使用權。這樣，就把“歸還”變成了一句空話。

英美兩國都援助南京政府，把它看作一個能够阻止革命的力量。美國在南京佔優勢，英國當然不高興。英美的矛盾使英國出來支援反蔣介石的廣東派國民黨。

因為革命失敗了，因為民族統一戰綫破裂了，所以中國衰弱了，日本就決定利用中國之衰弱來開始它的對華公開侵略政策。

自中國革命失敗之後，日本資本同美國資本一道打入了中國內地。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地位大大增強了。東北煤產百

分之九十五在日本手中。在全中國的煤業中，日本資本佔百分之六十。日本資本在紡織工業中的百分比也增加了。在中國的日本工廠越來越多。

在一九二七年，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綫剛剛分裂，中國因之衰弱，當時日本的新首相田中馬上就對日本天皇上了所謂日本“積極政策”的奏摺（即“田中奏摺”）。田中在這個奏摺中陳述了其征服世界的帝國主義夢想計劃，首先侵略中國東北及整個中國的計劃。“欲征服中國，當先征服滿洲及蒙古”，“欲征服全世界，當先征服中國”——就是這奏摺中的話。

田中的夢想計劃又想攻擊蘇聯，佔據蘇聯領土。

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軍隊佔了山東，這是違背九國公約的。同年五月三日，發生了所謂“濟南慘案”。日本軍隊在濟南城攻擊中國軍隊，虐殺中國平民。日本軍閥又殘暴地對待南京政府的代表團。日本人把中國政府代表的鼻子和耳朵也割去了。

自從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之後，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總政策是：一方面準備對中國的新攻擊，另一方面支持中國的反動派。叛變了革命的國民黨政權之鞏固，帝國主義者認為這就保證了革命浪潮之不會再來。

中國資產階級相信南京政府的虛偽宣言。但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却是反乎這些資產階級人士之幻想，是完全反人民的，是叛國的，是犯罪的。這外交政策，先是縱容了日本對華侵略，然後是使得美帝國主義的地位大大加強。

在對內政策上，南京政府制定了法律，想對各省軍閥予以政治控制。但是，雖然南京政府在紙面上統一了全國，而在實

際上，真正的統一並沒有實現。

國民黨已經變成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反革命聯盟。但其自身仍是由互相仇視的各系軍閥拼湊起來的：南京系（蔣系）、廣西系（桂系）和廣東系（粵系）。因此，不久，就發生了新的軍閥混戰。

爲了鞏固自身的政權，南京政府曾企圖發展工業、財政及交通建設，特別要建立武裝力量以反對人民。爲此目的，南京政府邀請了外國財政顧問、經濟顧問和軍事顧問來中國，更加增長了中國對帝國主義者的依賴性。

政府宣佈廢止釐金（國內的關稅），但是却代之以“消費稅”，這對人民是同樣重的一種負擔。因爲害怕農民，所以想對農民作些小的讓步，答應解決土地問題。因爲害怕工人階級，所以編了工人問題的法律草案。以及諸如此類。一九二九年公佈了所謂“勞動法”。這個勞動法對工人階級並無絲毫好處。就是這樣的法律也沒有實行。稍晚些時到了一九三〇年，公佈了所謂“土地法”，保留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對農民之農奴式的剝削。在土地法中僅僅說到多少減一些地租。就是這樣的土地法也沒有實行。

在政治方面，國民黨政府實行了兇狠的恐怖政策，以殘酷手段鎮壓革命運動。中國人民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所爭得的民主權利都被取消了。國民黨用法西斯的方法去對付一切異己，對共產黨更是特別殘酷。國民黨的監牢中關滿了共產黨員，逮捕拷問和處死，成爲日常現象。但不論國民黨如何瘋狂殘暴，畢竟無法阻止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新高潮。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並沒有解決了國家當前的任務。

中國當前的任務，引起中國革命的那些任務，並沒有被這次革命的廣州階段及武漢階段所解決。因此，這些任務的解決就有待於後來的另一革命階段。

關於這一問題，斯大林同志曾說：

“第一階段解決了打倒外國帝國主義的任務沒有呢？沒有，沒有解決。它把這一任務交給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執行去了。”

“應該認為革命的第二階段也不能完全解決驅逐帝國主義者的任務。它（指第二階段，即武漢階段——譯者）將進一步推動中國廣大工農羣衆去反對帝國主義，但它這樣做是爲了把這個事業交給中國革命的下一階段即蘇維埃階段去完成。”（斯大林：“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一九二八年二月的第九次全體會議用下面的話形容中國的當時狀況：“中國革命的當前時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不論從經濟觀點看（土地革命及封建關係的消滅），或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的觀點看（中國的統一及民族獨立），或政權階級性的觀點看（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這次革命都不能算完成。”

一九二八年夏季所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決定中國革命的現階段爲“準備羣衆的力量以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階段”。

一九二八年夏季，中國共產黨也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大會總結了中國革命兩個階段的教訓，曾定下黨的當前任務。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形容一九二八年的中國情勢爲“革命新高

潮的準備期”。如第六次代表大會所指出者，中國有些地區已經有開始革命新高潮的少數徵候，但是中國革命浪潮之暫時低落及反動時期仍舊繼續下去了。黨的代表大會又指出革命高潮之零星徵候——如廣東的農民起義及海陸豐的蘇維埃共和國——並不就表示反動時期之終了。城市中罷工運動之消沉也可表示革命浪潮之暫時低落：在一九二五年革命高潮時期，中國的罷工人數為八十萬人，在一九二八年，即革命失敗之後，罷工者僅有四十萬人。

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六次代表大會就警告黨內若干同志的盲動主義及冒險主義的情緒。在若干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中，這種情緒特別流行。他們無論如何不願意考慮真實的情況和中國革命的失敗，他們在一九二八年就號召馬上在全中國舉行武裝起義。

這時，反動勢力在中國得勝了，革命勢力削弱了並分散了，就為日本侵略中國掃清了道路。

日本帝國主義者，除了一九二八年春季的山東行動之外，又準備在中國東北積極活動。那時日本圖謀完全控制中國的東北。為此，就必須設法鞏固它在奉系軍閥中的勢力，因為奉系軍閥是東北的支配者。

東北的統治者張作霖，多少年來都是恭順地奉行日本帝國主義的命令的。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最後幾年中，特別是從美國積極援助南京政府以後，南京政府就不僅企圖伸張勢力到華北，並企圖伸張到東北，當時張作霖也改變方向而投靠美國了。南京軍隊之向華北移動，這表明美國的勢力不僅威脅了華北，也威脅了東北。這樣日本帝國主義便不擇手段

去行動了。於是他們就採用了他們所慣用的方法，將多年的走狗張作霖暗殺了。

中國革命的失敗也助長了帝國主義者的反蘇的侵略氣焰。他們認為，既然將中國“平定”了，就可以在中國領土上建立一個反蘇堡壘，並利用指使中國的軍閥去反對蘇聯。

被英美等帝國主義戰爭販子所鼓舞的東北當局，就依照蔣介石的命令，在白俄的積極參與之下，於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以武力奪取了中東鐵路。這就是爲了上述的反蘇目的。

按照一九二四年的中蘇協定，中東鐵路已成爲一種純粹商業性的經營，由中蘇雙方按合夥原則管理；管理局由中蘇雙方代表合組。但東北當局，突然襲擊鐵路管理局及所屬各機關，罷免並逮捕了許多蘇籍員工。對居住東北的蘇聯公民使用公開的恐怖手段。同時，又有一部分反動的東北軍闖入蘇聯境內。戰爭販子用中國的刺刀試探蘇聯的力量。蘇聯政府對此次衝突試用各種方法圖謀和平解決，但蔣介石的反蘇挑釁並不停止。蘇聯不得已，才宣佈與南京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並由勇敢的“特編遠東紅軍”予戰爭發動者以毀滅性的打擊，把反動的東北匪軍驅逐出蘇聯國境。國民黨政府在嚐到了蘇聯的威力之後，不得不恢復中東鐵路的原狀，而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伯力城(哈巴羅夫斯克)簽訂了所謂“伯力議定書”。

中東鐵路事件證明，蔣介石政府和國民黨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者手中的順從工具，只要帝國主義列強命令他們，他們隨時都準備幹新的罪行。通過這一事件使中國人民看清楚了，南京政府是個什麼東西，而國民黨已經變成了怎樣的一個反

革命匪幫。

游擊戰爭之發展和蘇維埃

自一九二九年末到一九三〇年初在中國開始形成新的革命高潮。雖然它的發展在各地區是不平衡的，但是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它的發展。

斯大林同志說：“只有瞎子和懦夫才會懷疑中國工人和農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

自從廣州公社失敗之後，一部分廣州工人從城中撤出來，和在廣東省打游擊的賀龍葉挺游擊隊相匯合。廣州起義失敗之後，海陸豐的蘇維埃共和國還存在了好幾個月。

一九二八年，在廣東的從化建立了蘇維埃，維持了好幾個月。一九二八年二月，在福建西部的永定縣，由於工人和農民的起義，也建立了蘇維埃政府。不久之後，賀龍和葉挺的部隊，連同從廣州撤出來的赤衛隊，離開了廣東省，轉移到湖南的醴陵，建立了蘇維埃政府。由於煤礦工人和農民的起義，在江西省萍鄉也建立了蘇維埃。以這些最初的蘇維埃為基礎，成立了最初的紅軍部隊。

這些最早的蘇區，以及在蘇區中產生的最初的中國紅軍，有些什麼特徵呢？第一個特徵就是他們相互之間還沒有聯系，他們是分散在華南的各地各區。

這一時期的紅軍是由零星的游擊隊合編而成，這些游擊隊的組織還很鬆散。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在這些游擊隊中負責的，除了軍官之外，還有士兵委員會，還缺乏統一

指揮和軍紀。

在建立蘇維埃的第一階段中，曾犯了不少嚴重錯誤。

在經濟政策上，在土地問題的解決上，曾犯了一些錯誤，發生了“左”的偏差及執行過火。在沒收及分配地主的土地時，蘇維埃有時竟牽連到農民的土地。他們跳越了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甚至禁止私營商業，管制市場物價。

他們想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去改變風俗習慣，去消滅宗教迷信，這也是偏差。

當然在政治方面有時也發生錯誤。雖然有這些偏差與缺點，但中國的蘇維埃總算發動了羣衆的鬥爭，爲正在發展的人民革命預備了基礎。在這些年月中，中國紅軍的主要革命幹部是形成了。

在最早的蘇維埃區域中，最鞏固的而又能執行正確政治路線的是毛澤東所領導的井岡山蘇區（在江西省）。毛澤東是在一九二七年“秋收起義”之後率領着他的隊伍（紅軍第一軍第一師）來到了井岡山的。

一九二八年四月，在寧岡縣的井岡山中發生了毛澤東所領導的隊伍和朱德率領從廣東退出來的游擊隊之歷史性的會師。由於他們的聯合，就產生了出名的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政治委員。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毛澤東在井岡山對該軍戰鬥員演說，他說：“在成千成萬人的腦筋中都有那兩位無產階級卓越的導師馬克思的名字和列寧的名字”。毛澤東又向戰士們說，他們不是孤立的，在遠遠的北方，也有同他們一樣的人在戰鬥着，這就是他們的弟兄和武裝同志。毛澤東又說：“俄國的工

人能做什麼，我們也能做什麼。”

在湖南，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第二階段中，已經展開了強大的農民運動，那時農民已經組織了農民協會，後來農民運動始終沒有間斷過。就是在湖南，共產黨的秘密組織和國民黨政府軍的某一師發生着聯系，彭德懷帶着這一師人起義，佔據了好多縣份，組織了蘇維埃。

由於工人農民和士兵的起義，在湖南也產生了紅軍。

但是直到一九二九年底，紅軍的這些隊伍還沒有組織在一起，政治上也沒有聯系在一起。

於是孤立的蘇區根據地和紅軍的少數部隊就開始對國民黨軍閥的圍攻作兵力不相等的戰爭。

在蘇維埃運動的最初數年，即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對紅軍進攻的還不是南京政府的中央軍，而是各省的地方軍隊。這些鬥爭還帶有地方性，還沒有採取後來那樣的正式圍攻的形勢。這是因為，蘇維埃地區還很分散，組織也很鬆散，對南京還不是一種直接的威脅。同時，當時的南京正與各個想保持獨立的軍閥集團鬥爭，特別是與所謂“桂系”。而南京和馮玉祥閻錫山的聯盟之間，也有了衝突。

紅軍擊潰了派來打它的那些政府軍，擴大了蘇區，建立了蘇維埃政府的最初機構：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和蘇維埃，召集了蘇維埃的省區代表大會等等。蘇區的面積和紅軍的數目都擴大了。在一九二八年，中國紅軍僅有一萬名戰士，到了一九二九年就超過了六萬人*。

* 一九二九年應為二萬二千人。一九三〇年為六萬人。

於是在中國就發生了新的革命高潮。

革命高潮和蘇維埃運動的擴大

在國民黨叛變了革命和拆毀統一的民族戰綫之後，斯大林同志說：

“從前，在國民黨興盛時期，沒有立即成立蘇維埃的有利條件，可是現在，當國民黨人因為勾結反革命而聲名狼藉、威信掃地的時候，在運動獲得進展的情況下，蘇維埃就能成為而且事實上就要成為把中國工人和農民團結在自己周圍的基本力量。誰來領導蘇維埃呢？當然是共產黨人。”（斯大林：“俄國反對派的政治面貌”）

一九三〇年，在中國的各工業中心，共產黨所領導的罷工運動大大展開。一九二八年的罷工人數是四十萬人，一九二九年已經增加到七十五萬人。這證明，工人階級已經醫好了創傷，共產黨已經恢復了被反動派所摧毀的組織，重新站在新革命高潮的前頭。

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也促進了這次革命高潮。經濟危機籠罩了全中國，中國農產品的價格大跌，好多工廠關了門，失業人數增加了。於是銀價大跌，而在那時，白銀還是中國的主要通貨。

大工業中心的工人運動也幫助了現存的蘇區之鞏固。在蘇區中，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的領導都加強了，紅軍也鞏固了。

一九三〇年仲夏，中國紅軍獲得了一些偉大的勝利。

彭德懷所領導的紅軍第三軍包圍了長沙。湖南省主席駱瑤了，馬上打電報給南京，請求立即派遣精通築城及防禦工事

的軍事專家到長沙來。有十二個德國軍事工程專家，蔣介石的顧問，來到了長沙，開始做城防工事。長沙的磚城和城壕是當時紅軍的最大障礙。要克服這些障礙，需要相當的技術，而紅軍却缺乏這種技術。按照德國人的意見，環城都架設了鐵絲網，並且通上電流。

德國的專家向湖南省主席担保，紅軍決不能衝破這些防禦工事。省主席放心了，於是設宴招待德國人。

但是在七月二十七的夜間，紅三軍的英勇部隊突破了防禦工事，衝進了長沙城。省主席和那羣德國顧問幾乎來不及逃出長沙。

解放了的長沙城快樂地歡迎人民的軍隊。彭德懷組織了湖南的臨時蘇維埃政府。人民的政權開始行動了。據許多新聞記者的報道，新政府曾沒收富戶的糧食，分發給貧民，並舉辦居民糧食的總分配。長沙城內成立了市蘇維埃、區蘇維埃、黨區委。又成立了房屋管理局，開始將工人家庭從貧民區遷到市中心區的優良住宅，並將資產階級和地主遷到城郊去。將省主席的住宅改爲人民俱樂部，將長沙一座最大的花園改爲高爾基公園。羣衆文化工作也展開了。

一個外國新聞記者寫道：“城內立即懸掛了紅旗，長沙城內到處是小冊子和傳單。成立許多工會，其中有鐵路工會和水手工會。全城……每區都由工人委員會領導，統歸市蘇維埃管轄。對地主及富商徵收特別捐。”

到了第四天，有外國砲艇開到了長沙城邊的湘江，其砲口都是對着長沙城。雙方兵力相差太多。所以紅軍和市民雖然十分英勇地保衛長沙，而長沙還是失去了。

外國軍隊的干涉在長沙的陷落中有很大的作用，關於這一點，美國人辦的“密勒氏評論報”也承認的。

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密勒氏評論報”的社論中說：

“這一次，外國砲艇幫了中國政府很大的忙，幫它趕走了長沙的共產黨。外國砲艇站在中國政府這一邊，幫助它恢復了秩序（即恢復了軍閥的勢力——作者），中國政府自己顯然做不到這一點。”

工人們想拋石填江，使外國砲艇不能靠岸，但是這並不能阻止砲火。

到了第七天，彭德懷不得不放棄長沙了。開始先撤退了工人貧民及其家屬，然後紅軍部隊才撤退。

同時，在廣西省活動的紅七軍佔領了柳州城。在柳州城支持了六天。因為從越南方面飛來了法國的轟炸機，所以紅軍只好退出（柳州疑為龍州之誤——譯者）。

自從紅軍臨時佔領長沙、柳州等大城市的事件發生之後，反紅軍的工作遂由地方政府移到南京政府的手中。

但是在這個時候，湖南的蘇區，湘贛交界處的蘇區，廣東的蘇區，以及華南各省的其他蘇區都已經站穩了。

日本人佔領中國東北（九一八事變）

“日本帝國主義者眼看歐洲列強和美國因經濟危機發生而完全忙於內部事務，於是決定乘機來逼迫防衛能力薄弱的中國，企圖把它征服而成為那裏的主宰。日本帝國主義者並沒有向中國宣戰，却狡詐地利用他們親自造成的“地方事件”，像行竊似地把自己的軍隊開進東三省，日本軍隊佔領了東三省

全部地區，以便準備方便陣地去侵佔中國北部和進犯蘇聯。”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

日本帝國主義者決定的任務是攫取地方廣大而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連同最富足的天然資源的中國，把中國變作日本的殖民地。

除此之外，日本又把中國看作一個軍事基地，以便在未來帝國主義大戰中反對其他強國，主要是爲了發動對蘇的侵略戰爭。

一九三一年夏季，日本利用了有利的國際局勢（世界經濟危機），利用了英美法的協助，又利用了忙於內戰的中國之衰弱，開始攫取中國東北。

日本人在萬寶山地方挑起了一個仇殺。後來在七月七日，有一個日本上尉軍官名叫中村的被殺。最後，到了九月十八日，日本在南滿鐵路上運兵，又說“發現”了有人圖謀傾覆日本火車。

這一切“事件”都是日本自己製造的，用以解釋以後日本的行動。想藉此造成一種印象，彷彿日本軍隊是不得已出來保護日本在華僑民的生命與財產的。

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隊進攻瀋陽，瀋陽是當時東北的中心城市。

東北的統治者張學良（張作霖的兒子）遵從了蔣介石的命令，對日軍不予抵抗。不久，東北其他的城市也被日本軍隊佔領了。

十一月間，黑龍江的少數軍隊，不服從南京政府的叛國命令，予日本軍隊以抵抗。但因衆寡懸殊，不久就被日本軍隊所